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商代晚期的东西对峙

田 伟 Tian Wei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

殷墟一期以后, 商王朝出于保障西部边境安全等目的, 在晋南盆地与晋东南地区设置了两条南北向的防御阵线, 形成了不同时期东西对峙的局面。东、西方势力对峙的前线大部分时间都在晋南盆地及左近地区。处于防御阵线上的聚落在战时作为防御堡垒或向外攻击的根据地, 平时可能以贸易驿站的形式存在。商王朝及其附属势力、李家崖文化、西土集团之间并非一成不变的敌对关系, 而是持续变化, 不断整合。商代晚期偏早阶段, 李家崖文化对商文化威胁较大, 至商代末期, 李家崖势力可能已与商人结盟; 以姬姓周人为首的西土集团不断向东扩张, 摧毁了延续时间最长的晋南盆地防御阵线, 并攻击位于晋东南的太行山防线。周人攻灭大邑商后, 东西对峙局面不复存在。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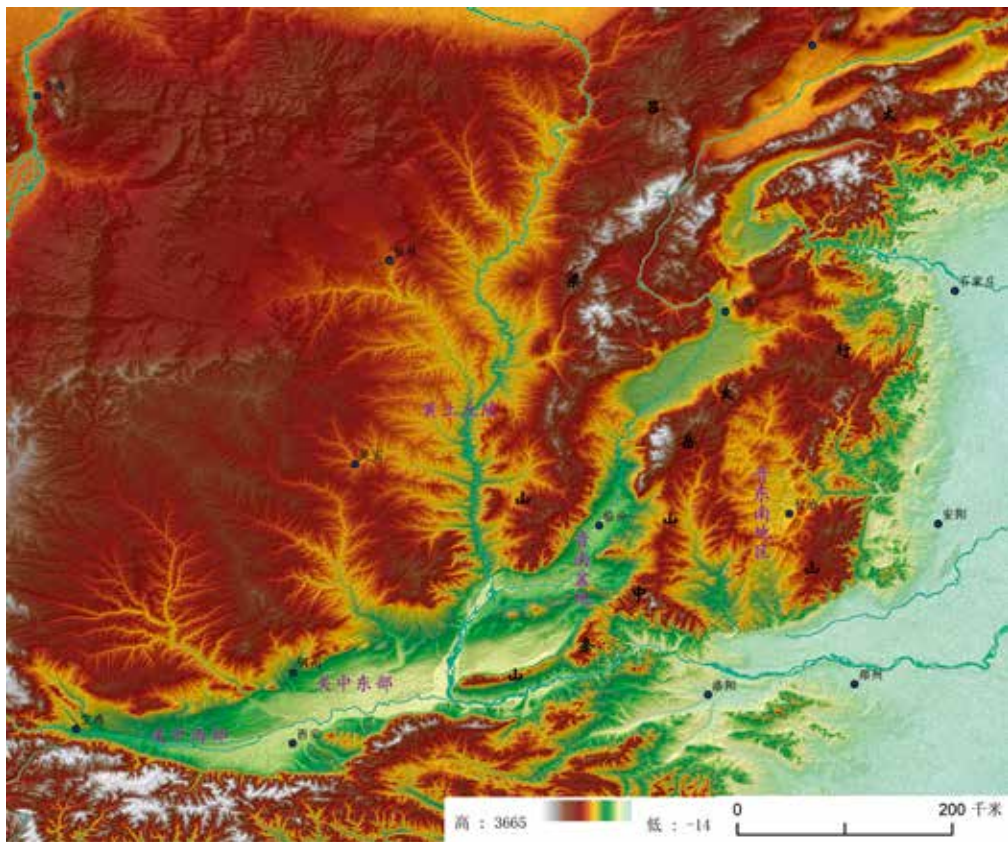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晋南 东西对峙

Abstract: After the period of phase I of Yinxu, the Shang dynasty constructed two north-south defensive lines in Southern Shanxi Basin and southeastern Shanxi area for the safety of its western border.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after developed in different times. The front of this confrontation was mostly in Southern Shanxi Basin and its vicinity. The settlements on the line were defensive fortresses or bases for attacks during wartime, and worked as trading posts in the time of pe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ang dynasty and its affiliated forces, Lijiaya culture and the Xitu(western region) hierarchy constantly changed through the tim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late Shang dynasty, Lijiaya culture became its major threat. However, by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Lijiaya force may have allied with Shang; meanwhile, Xitu hierarchy lead by the Zhou people of Ji clan expanded eastward, destroyed the longest-lasting defensive line in the Southern Shanxi Basin and attacked the line along Taihang Moutains in southeastern Shanxi. The eastern-western confrontation finally ended after Zhou people conquered Shang capital.

Key Words: Late Shang dynasty; Southern Shanxi;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二里岗上层阶段是商王朝的鼎盛时期，文化影响东至于海，西抵甘青，北达幽燕，南及湘赣。此后盛极而衰，至殷墟一期后，在北、西、南方向遽然收缩，主要分布范围逐渐收缩至豫东北、冀中南、齐鲁大部及晋东南等地区^[1]。晚商王朝的中心位于今安阳地区，殷墟遗址为其核心所在。安阳地区以西分布着多个地理单元，本文主要涉及的有晋南盆地、晋东南地区、黄土丘陵及关中地区。

山西西部为吕梁山脉，东部主要为太行山脉。两大山脉均以东北—西南向纵贯绵延。晋东南地区位于山西东南部，太行山脉南部的腹心地带，主要包括今长治、晋城两地。太岳山—中条山脉及其余脉自北向南将晋东南、晋南分割开来。山脉之间的河流谷地成为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汾河源自吕梁山脉北部，向南流经太原、晋中、临汾、运城等多个盆地，从侯马向西经新绛、河津等地汇入黄河，形成一条自北向南的天然通道。汾河自晋中盆地向南穿越霍太山便进入今临汾盆地。临汾盆地最南端自西向东分别为峨嵋岭、紫金山，再向南便进入运城盆地。不论是峨嵋岭还是紫金山，都不足以构成难以逾越的交通障碍。因此，临汾、运城二盆地历史上联系紧密，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也较为一致，可视作同一地理单元，称为晋南盆地。为便于研究，将太岳山、中条山脉西侧山前地带一些遗址也归入晋南盆地中。晋中、临汾盆地以西的吕梁山脉地区与陕西北部隔河相望，两地地貌相似，均为黄土高原地带，因水土流失导致地形千沟万壑，可视作同一地理单元，以往研究或称其为晋陕高原地区，或称之为黄土丘陵地区，本文暂取后者。关中地区北邻黄土丘陵地区，东临黄河与晋南盆地相望。学术界通常以铜川—西安一线为界，将其分为关中东、西部地区（图一）。



图一 本文主要涉及的各大地理单元

邻近商王朝腹地的晋东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虽较少,但已发现了较为丰富的商代晚期遗存,刘绪师上世纪80年代在此区域调查时,就发现了较多晚商时期的文化遗址,如屯留中村、恼张、东庄,长治县(今长治上党区)韩店、景家沟、安城等,并在长治博物馆看到了殷墟各期的陶器^[2]。本世纪初,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市文物旅游局联合组队,在浊漳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发现一批先秦遗址,其中包括较多晚商遗址^[3]。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与安阳地区典型商文化遗址所见者基本一致,表明该区域与安阳及周边地区同属于商王朝的核心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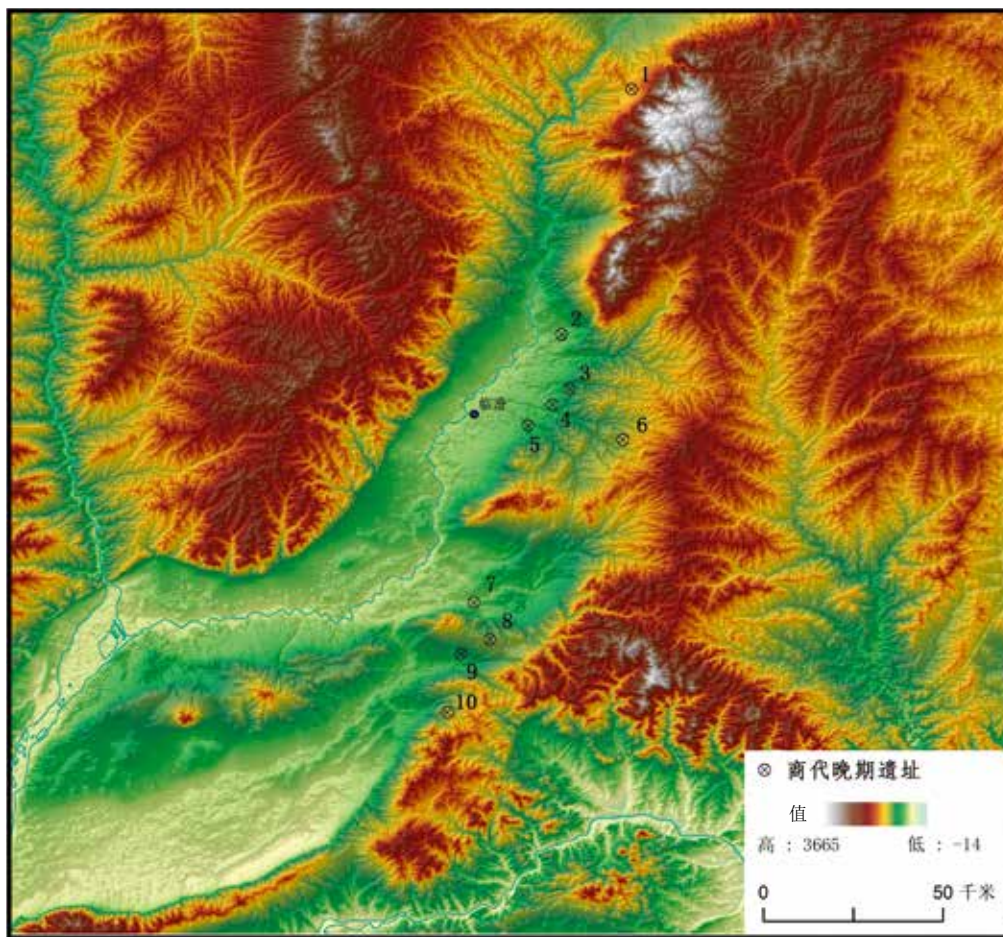
晋南盆地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向以适宜人类生存名著于世。区域内不仅土地肥沃,适于耕作,且有铜、盐之利,曾孕育出诸如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夏县东下冯、绛县西吴壁、曲沃天马一曲村、闻喜上郭村等先秦时期的中心聚落。自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开启国人主持的考古发掘以来,前后有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在晋南开展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工作,其中不乏全覆盖式的区域系统调查,构建起了基本齐全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但所获商代晚期遗存可谓寥寥^[4]。如此,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处于广义中原地带的晋南地区,在商代晚期成为了“无人区”。这一现象不仅见于晋南,还见于自然环境较好的豫西地区。

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商王朝与西北方国频繁争斗,使得晋南地区经常成为战场,不再适宜人类生存,故而人烟稀少^[5]。第二种观点将原因归咎于某种因长期干旱导致环境恶劣,甚至引发瘟疫,该区域(主要指洛阳盆地)形成了令人恐惧的“死亡之地”^[6]。第三种观点首先假设商王朝占领晋南,目的是控制晋南的盐、铜等资源。后因表层的氧化铜矿被开采殆尽,而冶炼硫化铜的技术直到西周早期才开始出现在南方地区,故在殷墟时期离开晋南另寻他矿^[7];产自山东的海盐与晋南盐池生产的盐略有不同,后者因为含有大量的硝而带有苦味,相对而言,山东所产之盐可能更受欢迎。商王朝因对盐、铜等战略资源的需求地发生了变化,所以退出了晋南^[8]。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晋南盆地多个地点发现了商代晚期遗址(图二),区域内自北向南已有洪洞坊堆—永凝堡、杨岳、前柏,浮山桥北,临汾庞杜,曲沃西周,绛县周家庄、乔野寨,闻喜酒务头等遗址。学术界对上述遗址还缺乏系统研究,此处略加分析。

桥北遗址位于浮山县北王乡桥北村西南的坡梁上,地处太岳山西麓,紧邻临汾盆地东部,向东北经古县可至长治、安阳;往东南溯响水河经翼城可通沁水、晋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98—2002年,桥北墓地持续被盗,并因现场缴获带有“先”字徽识的青铜器而震惊学界。2003年3—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临汾市文物局、浮山县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桥北遗址展开抢救性考古工作,首先在重要区域进行了考古钻探,之后选点布方发掘,累计揭露商周时期大、中、小型墓33座。所见大型墓葬均被盗,随葬品残存无几^[9],幸有部分铜器被公安部门追回^[10],另有少量青铜器流落日本^[11]。

桥北墓地处在名为“南疙瘩”的坡梁上,西部邻近断坎,晚商大墓M1墓道紧贴断坎。M1为一座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不可能紧靠断崖而建。这说明此处地形变化很大,坡梁西侧必有墓葬因水土流失等自然因素遭到毁坏。联合考古队未对墓地进行全面钻探,发掘工作也比较有限,仅清理了一些大墓和周边少数小墓。商周时期,若非独立的“公墓”,墓地



图二 晋南河汾之东商代晚期遗址位置图

1.灵石旌介 2.洪洞坊堆—永凝堡 3.洪洞杨岳 4.洪洞前柏 5.临汾庞杜 6.浮山桥北 7.曲沃西周 8.绛县乔野寨 9.绛县周家庄 10.闻喜酒务头

中大、中型墓葬的数量应远少于小型墓葬。因此，我们看到的墓地信息并不完整，一些墓葬因自然因素遭到破坏，更多墓葬（或许包括一些大墓）并未被揭露出来。

发掘者已根据劫余随葬品对墓地进行了分期，所得分期结果较为可靠。笔者以发掘者的分期成果为基础，将桥北墓地大部分晚商墓葬归入殷墟二、四期。其中殷墟二期的墓葬包括大型墓 M1、M8、M18，中型墓 M20、M22；殷墟四期墓葬包括中型墓 M27、小型墓 M7 等。

属于殷墟时期者还应有大型墓葬 M9。发掘者指出，在 M9 盗洞中发现了一些西周中期以前的灰陶片。笔者认为，盗洞内所见三片陶片时代不一，其中鬲口沿与鬲足的时代定在西周中期之前尚可，泥质敛口豆盘的时代相对略晚，极可能属于西周晚期，甚至晚到春秋都不意外。因为晋南地区西周陶豆的发展序列已非常清楚，豆盘是从西周早、中期的侈口弧盘，逐步发展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近直口折盘^[12]。如此看来，M9 盗洞中看到的三件陶片形状不完整，时代也相差甚远，不大可能出自 M9，更可能是盗墓者挖破晚期地层，或是他人在填埋盗洞时，混入晚期陶片所致。因此，M9 盗洞中的陶片不能成为判断墓葬年代的根据。该墓形制、葬俗与墓地其他大墓近似，应同属埋葬在桥北墓地的贵族，劫余的随葬品如石圭、石璜都可在安阳找到形制相同者，将其年代笼统定在商代晚期应无问题。M9 打破 M8，而 M8 的时代为殷墟二期，故 M9 不早于殷墟二期，但也不应晚于殷墟四期。

浮山桥北出土铜器屡见“先”字徽识，学术界因此推测其属于先国墓地。殷墟甲骨文中“先侯”，说明先有可能是方国名称。另有学者指出，先可能是商王朝设在边境的据点^[13]。

坊堆—永凝堡遗址位于洪洞县大槐树镇永凝东堡村南，因出土西周青铜器、刻字卜骨而闻名于世，早年就有学者预测该遗址可能存在商代晚期遗存^[14]。近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会同洪洞县文博部门在该遗址及周边地区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属于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15]。

杨岳遗址位于洪洞县淹底镇杨岳村，靠近临汾盆地东部边缘，位于经古县、安泽通往晋东南地区的通道上。1992年，山西博物馆回购弦纹爵、盃内戈各一件，这两件铜器的时代属于商代晚期，据说出自杨岳村^[16]。

前柏遗址位于洪洞县淹底镇前柏村，地处曲亭河南岸、临汾盆地经安泽前往晋东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上。曹大志曾在该遗址发现李家崖文化陶器^[17]。尚不清楚该遗址的主要内涵属李家崖文化，还是包含李家崖文化因素。

庞杜遗址位于临汾市尧都区县底镇庞杜村西北，地处晋南盆地东部边缘，汭河南岸台地上，扼守临汾盆地经浮山通往晋东南之要道。遗址所见墓地南北长400、东西宽200米，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2002年，因墓地被盗，临汾市文物考古部门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4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存在殉人、殉牲现象，出土大量青铜容器，以及玉、石、陶器等，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18]。最近有学者对庞杜M1、M2出土的铜器进行了年代学分析，认为庞杜青铜器的时代应该在殷墟四期或者进入西周，墓地葬者可能为息国的一支^[19]。

由目前所见材料可知，庞杜墓地时代属西周早期的可能性似更大，其文化内涵更加接近商文化。但因发掘范围有限，目前仅发掘其中4座，不足全部墓葬的百分之一，尚不能说明墓地内涵。考虑到其存在明确的晚商文化因素，极可能存在商代晚期遗存，故本文暂将其列入晋南晚商遗址之中。

曲沃西周遗址位于曲沃县北董乡西周村西，地处晋南盆地经浍河谷地通往晋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上，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调查发现少量可能属于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20]。

周家庄遗址位于绛县横水镇周家庄、崔村之间，地处涑水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背靠紫金山，南临涑水河，向南扼守晋南经轵关陁东出中原腹地之要道，东邻运城盆地北经紫金山进入临汾盆地之捷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包含多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中二里岗上层、殷墟文化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东南部，面积不小于10万平方米。2013年，在遗址中发现少量“商周之际”的陶器，这些陶器的时代可能早至殷墟四期^[21]。2017年秋季又发现少量殷墟文化时期的居址与墓葬遗存。因工作有限，仅清理几座灰坑，出土少量陶器；发现一处墓地，但未做系统工作，仅发掘其中数座小墓。据随葬陶器判断，这些小墓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三期^[22]。

乔野寨遗址位于绛县古绛镇乔野寨、东吴村之间，西距周家庄遗址3公里，处在运城盆地东部通往临汾盆地的交通要道上，并与周家庄遗址形成犄角之势，向南俯瞰轵关陁。该遗址东部为生活居址，西部为墓地。近年来，遗址西部地处东吴村的墓地屡遭盗掘，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因此于2019年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数件陶、铜器，时代为商代晚期^[23]。笔者曾数次率队前往乔野寨遗址调查，据盗墓劫余遗迹分析该遗址西部墓地至少长110、宽90米，面积不小于1万平方米。东部的居址区兼有庙底沟二期、商代晚期遗存，其

中商代晚期遗存分布区域略偏南^[24]。

酒务头墓地位于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地处运城盆地东部边缘，中条山西侧的山前坡地上，扼守晋南盆地经石门镇穿越中条山通往垣曲盆地的交通要道。2015年，酒务头墓地遭严重盗掘，2017—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并发掘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其中带墓道大墓5座，编号为M1—M5，中小型竖穴土坑墓7座。除墓地最东侧的M1外，其余墓葬均遭盗掘^[25]。据出土器物，可知酒务头墓地时代约相当于殷墟四期，葬俗与典型商文化十分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大墓的墓道连接的是墓室长边，与一般情况下大墓墓道连接墓室短边有所不同。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看出，晋南盆地晚商时期商文化或与商文化貌似相近的古代遗址基本都位于河汾之东^[26]，靠近山地的盆地边缘地区，有些遗址已进入山区。晋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历史虽然较长，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做的也比较多，但这些工作大都在盆地腹心地带开展，而盆地的东西边缘，靠近山地之处的考古工作则少得多，未能发现类似遗址实属情理之中。

除周家庄遗址外^[27]，晋南盆地经过正式发掘的殷墟晚期遗址均发现了不早于殷墟二期的大型墓葬。说明这些聚落之中居住着高等级贵族，聚落本身具有较高的等级。从聚落分布的角度来看，这些聚落周围基本不见同时期的中、低等级聚落，这不但与商文化腹心地带不同，也与西部的李家崖文化（详后）存在差异。

二

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山西西部、陕西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的多个地点陆续在生产活动中发现了多批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山西、陕西两地及其他一些考古机构也在此区域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工作，发掘了山西柳林高红^[28]，陕西清涧李家崖^[29]、辛庄^[30]等遗址，为学术界认识黄土丘陵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不断发现的同时，经过邹衡^[31]、郑振香和陈志达^[32]、李伯谦^[33]、李海荣^[34]、吕智荣^[35]、沃浩伟^[36]、蒋刚^[37]、朱凤瀚^[38]、曹玮^[39]、张天恩^[40]等学者的研究，学术界对分布于黄土丘陵的晚商遗存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多数学者将此类遗存称为李家崖文化。对于李家崖文化的绝对年代，学界虽有分歧，但均认为其主体年代处于晚商时期^[41]，大都将其视为商王朝的敌对势力，认为其应属殷墟甲骨卜辞中位于西北的方国（如鬼方）。

李家崖文化主要分布黄土丘陵地区东南部。这一区域的地形千沟万壑，崎岖不平，很难进行全覆盖的区域系统调查，幸有多次文物普查为我们带来了一些线索。曹大志近年通过检视晋、陕两地以往调查资料，并赴黄土丘陵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共确认晚商遗址406处，辨识出不同于李家崖文化的西抓渠类型遗存，指出西抓渠类型人群主要从事游牧经济，是近年来李家崖文化及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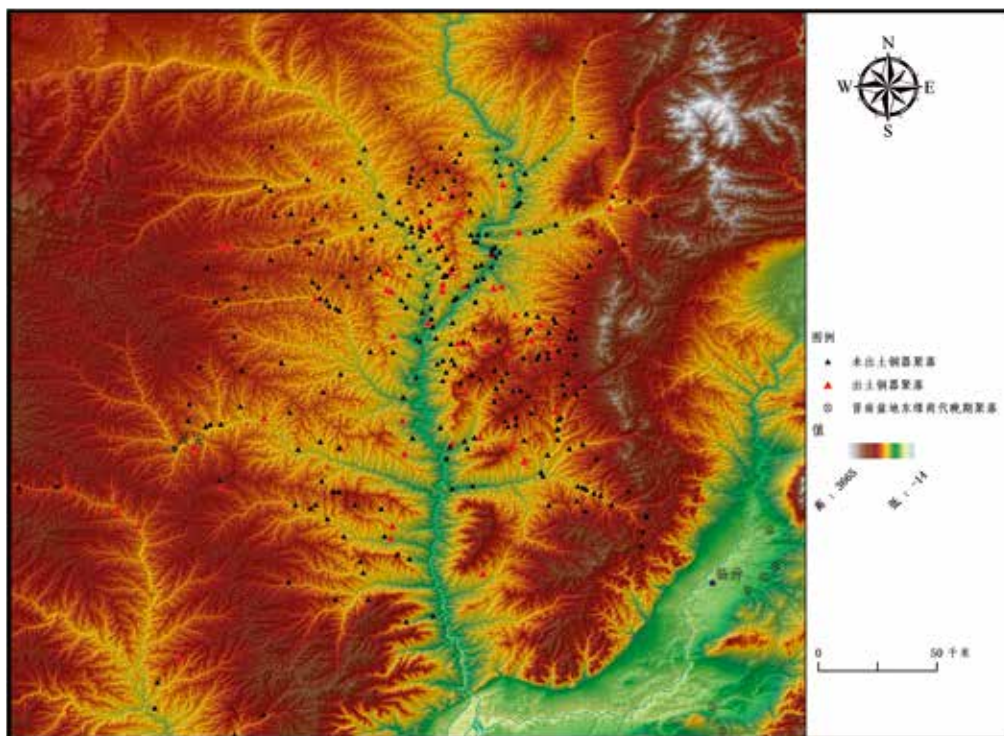
因考古工作开展有限，我们对大部分李家崖文化的聚落内涵都不了解。有限的踏查资料^[43]表明，多数李家崖文化聚落面积较小，仅千余平方米，一般只发现陶、石、骨器，其中极少数出土铜器，属小型聚落。稍大者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多分布于河流交叉点上，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相对便捷的交通条件。此类聚落内涵稍显丰富，一般都发现铜器，可能属于小区域中心，暂称之为中型聚落。值得一提的是，李家崖文化遗址的铜器多为现代人类生

产活动中偶然获得，缺少考古背景。推测这些铜器大都出自遭破坏的墓葬。事实上，因缺乏系统调查，出土铜器的聚落范围并不清楚，不排除一些出土铜器的小型、稍大型聚落规模实际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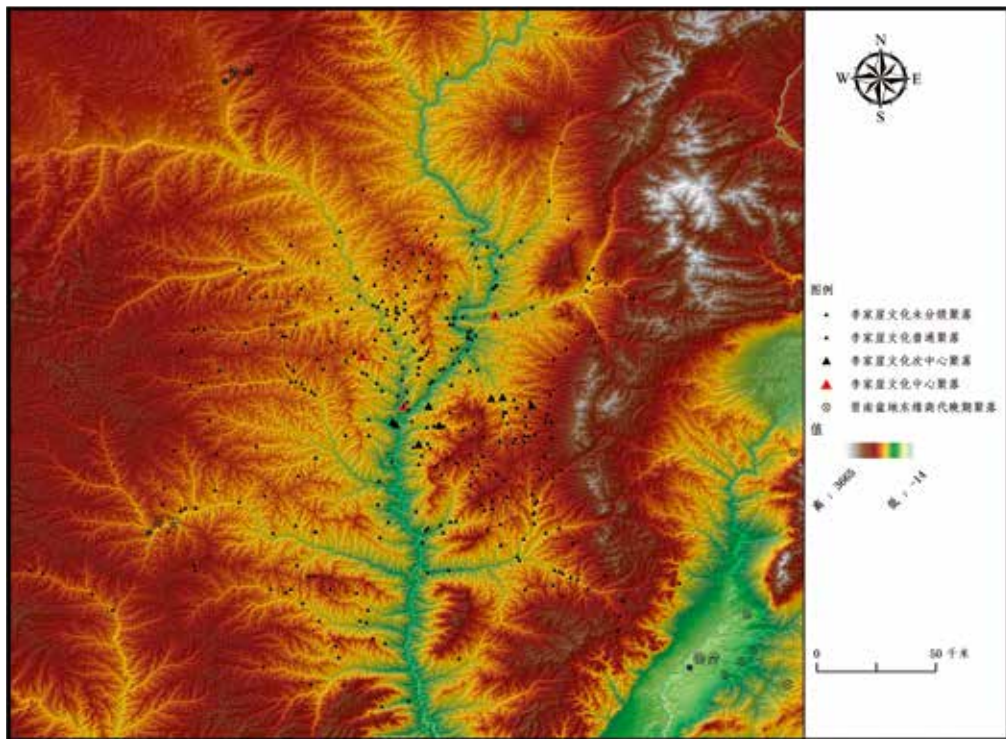
已发现的李家崖文化遗址中，少数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内涵十分丰富，存在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并有面积较大的单体夯土建筑，有些还发现了铸铜作坊。如柳林高红、清涧李家崖、辛庄等遗址范围均在数十万平方米。李家崖遗址已发现面积达 6.7 万平方米的城址，内有多座夯土院落、建筑基址；辛庄遗址更是发现了夯土建筑群，在山茆顶部的发现了 20 处集中分布的夯土遗迹，其中包括一处总面积超过 4200 平方米、堪称晚商时期北方地区面积最大的夯土建筑^[44]。这类聚落当属不同势力的政治、经济中心，是李家崖文化中的大型聚落。

小型聚落数量最多，中型聚落较少，大型聚落较少的现象，构成了一幅生动的金字塔式聚落分布结构（图四）。由考古遗存展示出的等级、性质差异，揭示出大型中心、区域中心及小型聚落的不同内涵。小型聚落是李家崖文化社会的基本单元，承担着简单消费品的生产；中型聚落可能是区域贸易中心，担负着简单消费品的交换，事务联络等职能；高等级聚落拥有黄土丘陵地区最好的自然资源，明显占有高等级消费品。聚落内的人群在生存、埋葬方式上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大型聚落中的高等级建筑、技术密集型的铸铜作坊，说明李家崖文化先民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并且具备了成熟的公共权力，复杂的行政机构，行之有效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凡此，均暗示着李家崖文化不同等级聚落之间存在着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

吕智荣先生较早指出，李家崖文化人群以从事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的生活^[45]。曹大志进一步论证李家崖文化人群主要从事粗放的农业，具备烧制陶器的能力^[46]。大量的农作物



图三 李家崖文化出土铜器聚落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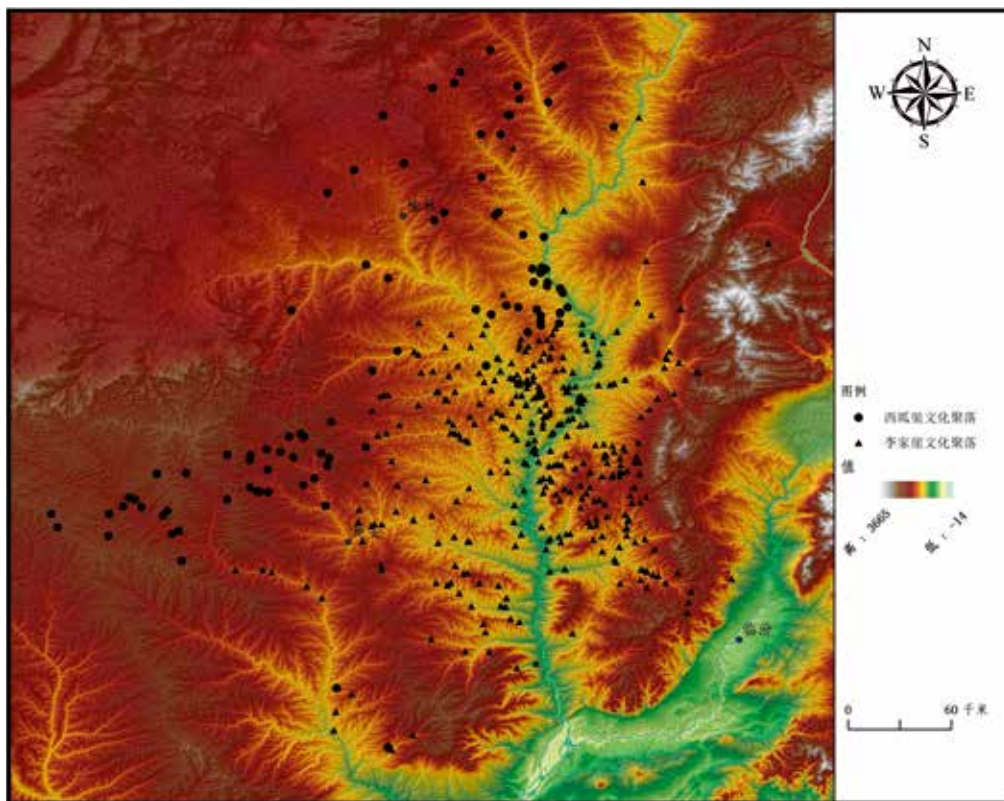
图四 李家崖文化聚落分布图

种子, 饲养猪等家畜显示出李家崖人群较高的定居程度。在当时的环境下, 这种生业结构决定了李家崖文化需要拥有保卫生产生活资源的暴力机构。大部分发现铜器的聚落都可见地方特色浓厚的青铜兵器, 暗示着李家崖文化有着较为强大的武装力量。

综上所述, 李家崖文化高等级贵族拥有组织人力发动战争的实力和资源。他们或许不具备攻占大邑商的实力, 但黄土高原千沟万壑、交通十分不便、易守难攻的地形, 足以帮助他们应付来自中原的攻击。他们不但具备与商王朝核心势力抗争的实力, 也拥有不定时骚扰, 掠夺资源的能力。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商王朝差别不大^[47]。正如刘绪师所言, 晋陕高原的考古遗存并非只有极少的晚商遗址和零散的墓葬, 而是相当丰富和复杂^[48]。

西瓜渠类型只有蛇纹鬲、甗、罐、红陶三足瓮四种陶器, 源头是朱开沟文化, 主要分布于绥德、子洲、米脂、榆阳、神木、府谷、安塞、志丹、吴起、佳县、子长、横山等地; 石器群则由大量燧石细石器组成, 基本不见磨制石刀、石镰等农具, 具备游牧民族的特征。曹大志指出, 西瓜渠类型也可称之为西瓜渠文化^[49]。笔者以为, 鉴于西瓜渠类型不论是陶器文化面貌, 还是生业经济和生活方式, 都与李家崖文化有明显区别, 其与李家崖文化是并列关系, 直接称之为西瓜渠文化更为妥当。从分布范围的角度来看, 西瓜渠文化紧邻李家崖文化并有不少交错之处, 以游牧活动为主业的西瓜渠文化实际活动范围可能更为广大, 他们可以为农业民族带来牛、羊和马等资源,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骚扰和劫掠, 二者之间关系如何, 需待材料丰富后再行探讨。

关中地区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较为复杂。在关中西部, 商代晚期主要分布着郑家坡文化、碾子坡文化、刘家文化。学术界对上述三种文化的族属为何尚存争议, 焦点在于争论何种文化属先周文化。有学者将之统称为西土集团^[50], 甚为恰当。西土集团在商代晚期持续东进, 至迟于殷墟三期开始进入关中东部, 并于商代末期完全占据这一地区。



图五 李家崖与西孤渠文化聚落分布图

关中东部商代晚期聚落自北向南主要有陕西铜川红土镇、十里堡，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北村，渭南姜河村、南堡村，蓝田黄沟^[51]、怀珍坊，西安老牛坡等。

北村遗址位于今铜川耀州区演池乡，地处洛河以西，关中北部边缘地带，面积约1.8万平方米。1984年9—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该遗址揭露出丰富的史前及商代考古学文化遗存^[52]。其中商代遗存分三期，前两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岗下、上层，与二里岗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第三期约相当于殷墟二期，文化面貌与安阳所见者存在差异，有学者称之为晚商文化北村型^[53]。

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洪庆镇老牛坡村与袁家崖村之间，地处灞河东岸的台地上，是一处内涵丰富的商代遗址。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自1985年起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商代遗存，时代涵盖商代早、晚期。学术界对该遗址商代早期文化面貌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其属早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54]。但对其晚商阶段的遗存有不同看法，或以为其属于商文化，称之为晚商文化老牛坡型；或以为其不属于商文化^[55]。即使认同老牛坡相关遗存属商文化者，也承认其与殷墟商文化存在不小的差距，指出其“显然不会是由殷墟文化发展起来的”，是“与殷墟晚商文化有明显差别的”^[56]。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上，葬俗也有一定不同。此外，老牛坡遗址一些上层文化因素也有殷墟存在明显区别，如高等级建筑柱础的技术风格更加接近周原地区^[57]。说明在殷墟一期晚段，商王朝对老牛坡的影响已经极为微弱，将之归为商文化并不妥当，可暂称之为老牛坡类遗存。

关于老牛坡遗址的性质，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认同老牛坡遗址属晚商文化的学者，多将其视为西土集团的敌对势力，是见诸文献的崇国所在。提出这一认识的学者，多据

《诗·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认为这一记载是指文王伐灭崇之后，在附近的丰地作邑。笔者认为，如何理解前述文献中的两个于字，对于认识蕴含其中的史事至关重要。不少学者将前后两个于字都视为介词，解读为伐崇之后，在丰地作邑。清人俞樾已正确指出，崇之前的于应作邗解^[58]。邗、崇同为商系势力，二者并提，说明相距不远，并且是先伐邗，后再伐崇，崇距离周的距离很可能比邗更远。邗在河内，即今豫北地区。据考证，崇在嵩山一带，今河南嵩县附近^[59]，不应在西安。老牛坡遗址定然不是崇国所在。

早商时期，不同于关中西部的二里岗文化京当型，关中东部是二里岗文化二里岗类型的分布区域^[60]，与商人关系更为密切。但关中东部晚商遗存与殷墟差异巨大，说明商人已经失去了对关中东部地区的实际控制。至迟在商代末期，关中东部已被纳入西土集团的势力范围。当然，文献资料显示，商王朝还是关中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此后可能也试图重新占领这一地区，但自武乙受挫后，商王室便很少再染指关中。至于《史记·殷本纪》所载“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61]，不过是西土势力收买人心的手段罢了。

三

商文化在殷墟一期后的大幅收缩，生动的演绎了王朝盛极而衰的场景。关于商文化由盛转衰的具体动因，多数学者认同是“九世之乱”及其余波所致。在这一大背景下，商人逐渐退出关中、晋南盆地的核心地区。既有考古学资料表明，殷墟一期后，商人为抵御来自西方的威胁，在其边境布置了两条南北方向的防御阵线，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

商人大约从殷墟二期开始，在晋南盆地及邻近地区^[62]布置了第一条战略防线。这条阵线由包括多个位于晋南盆地东缘在内的据点组成，大致沿太岳山西麓—中条山西麓一线布置，形成居高临下，俯瞰西方，南北呼应，联通腹心的局势。如计入霍太山以北的灵石旌介遗址，这条防线上自北向南已有灵石旌介，洪洞坊堆—永凝堡、杨岳，浮山桥北，临汾庞杜，曲沃西周，绛县周家庄、乔野寨，闻喜酒务头等遗址。上述据点大都凭险设置，处在晋南盆地通往王朝腹地的交通要道上。从地理角度来看，坊堆—永凝堡、杨岳等遗址扼守经古县、安泽通往晋东南的通道；临汾庞杜、浮山桥北扼守临汾盆地经古县通往晋东南，以及经响水河、翼城通往晋东南的通道，曲沃西周遗址在东南与浮山桥北形成犄角之势；绛县乔野寨、周家庄、闻喜酒务头等遗址防守晋南盆地经垣曲通往豫北之通道。

前文已述及晋南盆地东部边缘商代晚期聚落大都可划归大型聚落之行列。这与商王朝腹地及李家崖文化分布区兼有各级别的聚落不同。晋南盆地东部内涵较为清晰的遗址周围（主要是南、北、西方向）不见或少见其他中、小型聚落，说明这一时期的人群主要集中于大型聚落，目的是集聚力量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他们以晋南阵线为基础，依托汾河等天险，与西部诸势力形成东西对峙，晋南盆地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双方对峙的缓冲地带。晚商时期，人是极为宝贵的战略资源。据甲骨文记载，当时经常有掠夺敌方人口的情况存在。不管是商系人群，还是西方的李家崖、西土集团等人群，居住在对峙中心的晋南盆地自然极不安全。

东西对峙局面在周克商后宣告结束，以联袂鬲为代表的周系人群在西周早期进入晋南地区，如天马—曲村等遗址之所见。不论是商系势力退出，还是周系势力迁入，都先后与

商文化在殷墟一期后的退缩、周克殷商等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并广泛见于国内多个地区^[63]，而非仅在晋南地区出现，充分说明东西对峙及频繁战争是晋南盆地核心地带缺少晚商遗存的主要原因。

见于先秦文献的西伯戡黎，暗示着周文王已可跨越晋南盆地向邻近商王朝腹地地带的太行山西麓用兵。黎国位于晋东南地区东部边缘的黎城，东距商都安阳不足百里。周人敢于在此用兵，说明晋南盆地东部边缘的第一条防线已被瓦解。晋侯墓地 M31 出土文王玉环铭文曰：“玟（文）王卜曰：我累唐人弘彘（战）崇人。”^[64] 记述了周文王联合唐人讨伐崇人的事实。唐位于晋南盆地河汾之东地区。多例甲骨卜辞说明，唐曾是商的臣属（或盟友），一度协助商王朝对抗来自西部（李家崖文化势力）的威胁^[65]，但此时，他们已经成为姬周翦商的仆从势力，进一步印证了晋南地区此时已成为西土集团的势力范围。

晋南盆地不少商代晚期遗址没有因商周交替消失，而是延续到了西周时期，如浮山桥北、绛县周家庄等，这应是其去商归周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浮山桥北等遗址不见周代大墓，暗示着一些高等级贵族仅存在于晚商时期，晋南防线崩溃后，他们不再居住其中。这些高等级贵族可能是商系贵族，与当地土著人群族属有别。

第二条防御阵线位于晋东南地区，因考古工作开展有限，此条防线目前尚不清晰，推测该防线可能依托地形，沿太行山西麓一线南北布置，阻止来自西部的军事势力跨越太行山攻击大邑商。西伯所戡之黎即位于此条防线上，扼守滏口径上的咽喉要道。但相比晋南盆地，商人经营晋东南防线的更长，阵线可能更为稳固。虽然黎国遭遇戡灭，但还有其他势力可以抵挡周人东进之锋芒。《史记·吴起列传》载“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66]，表明在商代末期，商人还控制着太行山一线，说明其在晋东南的防线较为成功。

设置两条南北向的防御阵线，是商王朝在不同时期对抗来自西方威胁的必要措施。商王朝及来自西方的势力在不同阶段活跃于防御阵线的东西两侧，互有攻守，偶尔出现犬牙交错的情形，例如李家崖文化前锋可能一度到达晋南盆地汾河以东地区，如洪洞前柏遗址^[67]之所见；商王武乙也曾猎于河渭之间。东西各方的文化因素，都可在对方文化的分布区中找到。

东部的商王朝与西部的李家崖文化、西土集团，以及西土集团内部，西土集团与李家崖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若我们将姬姓周人视为殷墟稍晚时候西土集团的代表，其与商王朝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从甲骨文及传世文献来看，二者关系可能经历了王与臣属、以及相互敌对的转变，在此期间可能还有多次反复。而商王朝与李家崖文化势力的关系更加微妙。如果我们李家崖文化视为包括工方、鬼方在内的多个与商王朝敌对的方国，这些方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但从出土与传世文献资料来看，在商代末年，他们似乎放下仇怨，成为了盟友^[68]。在殷墟发现的李家崖文化因素^[69]，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旁证。西土集团与李家崖文化之间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但从商代末年西土集团不断东进，商王朝与李家崖势力结盟，周初讨伐西落鬼戎的情况来看，二者之间在商代末年应一度处于敌对状态。据文献记载，商代晚期，季历曾攻击鬼方，并取得较大胜利^[70]。

商王朝对西方的经略并非只设立战略防线，王朝消费所需的许多资源都需要从西部引入，这些用于防御的据点可能同时起到了贸易中转站的作用^[71]。但对于商王朝而言，国家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在其整体实力下降，周边势力崛起的情形下，战略防御成为第一要务。事

实上,从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资料来看,商人在其势力强大之时,经常主动出击讨伐鬼方,周方等西部势力。但从结果来看,商王朝也很难将之彻底歼灭。而在战争中,除非彻底消灭对方,否则只能增加相互间的矛盾,进而加剧东、西方对峙的紧张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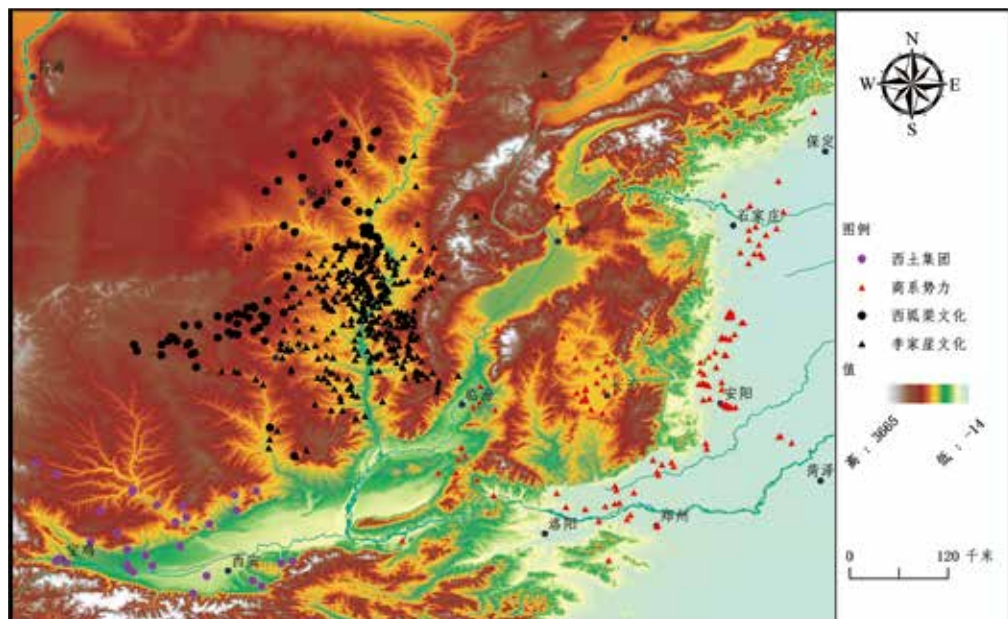
东、西方对峙局势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同人群受各种利益驱动形成的结果。

李家崖文化从事粗放的农业,随着实力的壮大,人口不断增加,对土地的需求逐渐增多,这应是其扩张的动力之一。晋南盆地河东盐池的盐、秦岭的绿松石矿与铜矿,对于任何势力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李家崖文化的分布范围距上述资源并不甚远,必然择机取之。因此,资源方面的吸引力,或许是李家崖文化扩张的动力之二。商人在晋南等地的防御据点同时也具有贸易中转站的职能,这些据点的各类消费品,甚至包括人口资源,可能都是李家崖文化势力垂涎之物。此为李家崖文化扩张动力之三。

以姬姓周人为首的西土集团向东扩张的动力与李家崖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李家崖文化向东扩张的动力适用于任何势力,包括姬姓周人。而周人与李家崖势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拥有更大的野心。周人不仅试图依靠强大的势力获取各类资源,更欲取殷商而代之。随着周人势力的不断扩大,周文王以“受天命”而称王^[72],并不时让出一些小利以换取政治资本,为取代殷商做道义上的准备。

东西对峙的局面体现了商王朝经营边境的一种策略,即在边境地区布设等级较高的据点,集中力量防范一切可能对王朝腹心带来威胁的敌对势力,择机出击,打击敌对势力。关于这些据点的性质,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所谓的商代方国;第二种可能是商王朝的派出机构;第三种可能是在商系高等级贵族治理下,包括商人与土著人群的混合体。就目前的资料而言,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具体原因将另文探讨。

商王朝在防御阵线上的据点并不孤单,虽然晋南与王朝腹心地带之间的区域考古工作开展较少,但在少量开展工作的地区,仍能看出遗址数量自西向东逐渐密集的趋势(图六)。靠近王朝腹心地带的遗址不仅可以作为前线遗址的后援,同时起到监督、防范可能出现的反



图六 商代晚期的东西对峙

叛。这些遗址在和平时期还可以作为连通东西的贸易中转站，为王朝获取西方的各类资源提供支撑。这种对边境的经营方式更像是后世的国家，而与周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判然有别，体现出商周两代国家管理制度之不同。

《史记·周本纪》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生动的说明了姬周翦商的过程。周文王在牺牲小利而立大德的同时，不断向外扩张，首先平定犬戎、密须，扫除后顾之忧，之后持续东进，摧毁殷商晋南防线后，攻灭耆（即黎），沉重打击了晋东南防线。在此基础上，打击邶、崇等商王朝的仆从实力，扫除了从河内进兵安阳的障碍，为武王克商奠定基础。此时的商王朝，对内不修德政，对外穷兵黩武，埋下了灭亡的种子。武王东进克商避开了险峻的晋东南太行山防线，转从孟津向北，最终覆灭殷商，东西对峙局势宣告结束。

笔者努力通过现有考古材料勾勒出商代晚期东西对峙，以及各方势力动态变化的历史图景。但囿于材料较少，本文的研究在不少方面都是较为粗疏的。如商代晚期分三期六段，但据现有材料难以展现不同期段东西对峙的动态变化。此外，前文已述及商周王朝经营晋南地区的政策有所不同，其中蕴含的是商周国家形态的剧烈变化。我们对周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已经有所了解，但并不十分清楚商人经营西部边境，乃至管理国家的具体手段。凡此问题，均需依靠在晋南等地区收获更多新材料方能解决。希望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在晋南等地区开展更多考古工作，为探讨商王朝经营西部边境及商代国家形态等重大学术问题贡献更多新的考古材料。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232）阶段性成果。

注释：

- [1] 刘绪：《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收入《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
- [2] 同[1]，第173页。
- [3] 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市文物旅游局：《浊漳河上游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44—352页。
- [4] 仅洪洞、闻喜有少量线索。
- [5] 孙华：《安阳时期商朝国家的政治版图》，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50、160页。
- [6] 王学荣：《偃师商城废弃研究——兼论与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4—311页。
- [7]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 [8] 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 [9] 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47—394页。下文涉及桥北墓地资料皆出于此，不赘注。
- [10] 《山西临汾破获文物案缴获商晚期“先”族青

- 铜器》，《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3日。
- [11] 何毓灵：《日本收藏的三件“先”族青铜器》，《中原文物》2014年第2期。
- [12] 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9—70页。
- [13] 曹大志：《“族徽”内涵与商代国家结构》，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
- [1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洪赵坊堆村古遗址墓群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 [15]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洪洞县文物旅游局、洪洞县博物馆：《山西洪洞县坊堆—永凝堡遗址晚商和西周遗存调查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0期。
- [16] 赵志明、梁育军：《山西省博物馆近年征集的部分商代青铜器》，《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 [17][42][43][46][49][67][71] 曹大志：《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7期。
- [18] 临汾市文物局：《临汾文物集萃》，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92—194页。
- [19] 韩炳华主编《晋西商代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27—730页。
- [20] 同[18]，第58—59页。
- [21] 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周代遗存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3期。
- [22] 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17年东区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0期。
- [23] 材料现存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蒙钟龙刚先生惠允参观，谨致谢忱。
- [24]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资料。
- [25] 白曙璋、高振华：《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国家文物局主编《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64—67页。
- [26] 笔者曾指出，司马迁所言河汾之东看似多余，因为汾之东必在河之东，但实际并不多余，因为运城盆地只在河之东而不在汾之东。晋南河汾之东可概指临汾汾河以东区域以及整个运城盆地。参见田伟：《试论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墓地的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
- [27] 事实上，周家庄遗址也发现了商代较大规模墓葬的线索。
- [28] 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4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试掘简报》，《三晋考古》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文物出版社，2013年。
- [3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清涧辛庄商代遗址》，吴晓丛主编《陕西文物年鉴》2012，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清涧辛庄遗址考古调查》，吴晓丛主编《陕西文物年鉴》201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种建荣等：《陕西清涧辛庄商代遗址》，国家文物局编《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
- [31]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71—282页。
- [32] 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6—70页。
- [33]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182页。
- [34] 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 [35] 吕智荣：《试论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214—225页；《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鬼方文化及相关问题初探》，《文博》1990年第1期。
- [36] 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杨建华、蒋刚主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6—67页。
- [37] 蒋刚：《文化演进与互动：太行山两翼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6—181页。
- [38]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92—1102页。
- [39] 曹玮主编《陕北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9年。
- [40] 张天恩：《陕北高原商代考古学文化简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9期。
- [41] 关于学界对李家崖文化的年代认识，祁冰有

- 较好的总结。参看祁冰：《李家崖文化年代再议》，《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
- [44] 种建荣等：《陕西清涧辛庄商代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52-55页。
- [45] 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 [47] 杜正胜：《从三代墓葬看中原礼制的传承与创新——兼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20-226页。
- [48] 刘绪：《晋西商代青铜器》序，科学出版社，2017年，viii页。
- [50] 西土集团的概念由韩巍先生最早提出。
- [51] 樊维岳、吴镇烽：《陕西蓝田县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5-27页。
- [5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3-342页。
- [53]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 [54][56] 同[53]，第154页。
- [55] 同[1]，第168页。
- [57] 刘绪师告知，谨致谢忱！
- [58]（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俞樾等著《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2005年，第4页。
- [59] 顾颉刚、刘起釞：《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56页。
- [60] 雷兴山：《对关中地区商文化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2期。
- [61]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6页。
- [62] 晋中盆地因考古工作开展较少，商代晚期遗存尚不清楚。推测可能存在沿晋中盆地东部边缘南北布置的防御阵线，同晋南盆地一起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在中条山南部的灵宝也有零星晚商遗存的发现，但具体内涵尚不清楚。
- [63] 本文多次强调，商人在殷墟一期后，在北、西、南方向全面收缩；周人克商后，以联袂鬲为代表的陶器在北至幽燕，南抵江汉，东至于海的多个地区迅速流行开来。
- [64] 陈剑：《释“琮”及相关诸字》，《甲骨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第300页。
- [65] 田伟：《试论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墓地的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
- [66] 同[61]，第2166-2167页。
- [68] 张天恩：《晚商时期陕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殷墟商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第117页。
- [69] 牛世山、岳洪彬、岳占伟：《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 [70] 《后汉书》引《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 [72] 周文王“受天命”之事见于多个早期文献中，如《诗·大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责任编辑 冯 峰）